
西南地区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以川盐入黔线路为例^{*1}

吴晓秋¹ 娄青²

(1.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01;

2. 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川盐入黔在沟通四川与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沿线(包括陆路和水道)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迄今, 贵州境内大量保存着因盐的运输、贩卖而存在的古建筑, 以及沿途重要的城镇和因盐而产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存记录了历史上川、黔两省之间人们的活动或迁移, 体现着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程。川盐入黔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是当前中国研究如何保护线性文化遗产的重点之一。

【关键词】:川盐入黔; 线性文化遗产; 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7)05-044-048

DOI:10.13713/j.cnki.cssci.2017.05.007

近十年来, 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专家提出了一个新理念, 即线性文化遗产, 它是之前的文化线路, 以及相近的遗产廊道、文化廊道、历史路径、线状遗迹等遗产概念的扩展和衍生, 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 是因人类的某种特定目的而形成的一条重要的纽带, 它将一些原本不关联的城镇或村庄串联起来, 构成链状的文化遗存状态, 真实再现了历史上人类活动的移动, 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交流互动, 并赋予作为重要文化遗产载体的人文意义和文化内涵。^[1]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 保护线性文化遗产逐渐成为人类研究文化遗产重要的发展方向。目前, 我国已建成由 19 个线性文化遗产约 25 万公里线性要素所构成的国家线性文化遗产网络。^[2] 在已建成的 19 个国家级线性文化遗产中, 涉及西南地区的只有茶马古道、古蜀道、长征线路和西南丝绸之路, 但事实上, 西南地区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线形或带状区域的文化遗产族群, 如川黔盐道, 它的存在记录了川、黔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历程, 在川、黔、滇三省经济、文化交流与对话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一、川盐入黔基本情况

在中国古代盐业史上, 四川井盐的生产与运销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史料记载, 清代四川产盐的州县有四十余个, 盐井六千

¹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西部基金项目“西南地区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研究”(11XSH013)。

作者简介:吴晓秋, 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学、文化人类学; 娄青, 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 主要研究方向:古建筑、古遗址保护。

余眼，乾隆时期盐的产量高达1.6亿斤。盐区主要分布在川北南部的西充、乐至、射洪、蓬溪，川南的犍为、富顺、资州、荣县、井研，川东的云阳、忠州、大宁、开县、彭水，川西的简州等地。其中川东地区不仅蕴藏量大，而且埋藏较浅，自然露头较多。

贵州自古不产盐，百姓食盐主要仰给于粤盐、滇盐和川盐，粤盐主要供给黔南的荔波、从江、黎平、榕江等县，滇盐主要供给黔西南的兴义、安龙、兴仁、册亨、贞丰等县，川盐供给的范围最广，几乎是整个黔西北、黔北、黔东北和黔东南地区的60多个县份。故明·田雯《盐价说》载：贵州食盐“仰给于蜀，蜀微，则黔不知味矣。”

有文献记载川盐入黔大约始于元代至顺年间(大约在1330—1332年间)，《元史·文宗本纪》载：“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云南行省言：‘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比因伯恩叛乱，云南盐不可到，马多病死。’诏令四行省以盐给之。”^①元代亦乞不薛地为太仆寺所属十四道牧马地之一，设有大牧马场，盛产“国马”，因缺盐马病之事常上奏朝廷。亦乞不薛经考证为贵州境内盛产水西马的黔西北地区，宋代经常贩卖至广西宜州(今广西宜山)等处，说明当时川盐除满足本省需要外，已开始销往贵州西北地区，但涉及川盐运销区的划分及入黔线路的详细史料记载阙如。

明初政局尚不稳定，出于军事和政治的目的，明朝在贵州境内广设卫所，给原本就缺粮、缺盐的贵州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洪武四年，朝廷始定“纳米中盐”则例，即将盐引分发到卫所，招募和鼓励商人将粮食运到缺粮的地区，换取盐引，然后到指定的地点购盐，再转运销售到民间。^②《明实录》载：正统十四年六月，“命招商于湖广清浪(今镇远县青溪)、贵州兴隆二卫中纳盐粮。四川上流等井盐每引米一石二斗；仙泉等井盐每引一石二斗”^{[3] 3461}又载：景泰三年五月，“有平越、都匀、普定、毕节四卫缺粮，所用有限，止用招商中盐减其则例，中纳者众。……宜从来请，四川盐七万一千八百八十余引、招商于平越等四卫纳米，仙泉井盐每引纳米二斗五升，上流等九井盐(引)纳米三斗”。^{[3] 6475}可见，明朝实行的纳粮与中盐并行，一方面通过纳粮来促进食盐在贵州的销售，另一方面中盐也极大地带动了军粮的供应，由于四川、云南与贵州比邻，川盐、滇盐因此源源不断地输入贵州。此时，川盐还没有在贵州的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清顺治、康熙年间，贵州仅贵阳、平越、都匀、思南、石阡、大定、遵义等府及安顺府属盘江以下30县、卫、所行销川盐。^③到了清雍正时期，随着贵州建制的逐步完善及清盐政的规范化，川盐在贵州市场进一步扩大，盐销量迅速增加，销售区由康熙年间的八府扩大为贵阳、安顺、平越、都匀、镇远、思南、石阡、大定、南笼、遵义等十府，^④占当时贵州省盐销市场的十分之七，奠定了川盐在贵州食盐市场的垄断地位。史载“贵阳、安顺、平越、都匀、思南、石阡、大定、遵义以上九府州食四川盐，……至乾隆中亦改，不食川盐者惟黎平一府云”，^[4]销往贵阳府所属地区的川盐，多产于四川自流井、贡井及射洪、荣县、蓬溪、富顺等县。

乾隆元年(1736年)，为彻底解决贵州食盐问题，清政府指定贵州为川盐的主销区，并划(叙)永岸、仁(怀)岸、綦(江)岸、涪(陵)岸为贵州食盐四大运销口岸。四川三台、射洪、蓬溪、中江、乐至等地的盐配涪岸；盐亭、富顺、内江、资州等地盐配纂、仁、永各岸；荣县之盐配仁岸。^[5]川盐销黔发展猛增，几乎占据了整个贵州市场。到乾隆56年(公元1791年)，除镇远、思州、铜仁三府“川淮并销，听从民便”，“黎平府属之古州同知一带地方……俱系买食粤盐”外，黔省各属均食川盐。^⑤1915年，改行“公司专卖制”，贵州盐业市场严禁其他食盐进入，全为川盐独占。1938年，因抗战淮盐来源全部阻断。1941年广西以桂南战事紧张为由，宣告禁止粤盐出境，至1941年底，贵州食盐几乎全为川盐。

川盐大量运销贵州，一方面刺激了川盐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这一时期黔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催生和促进了沿线一批城镇(市)的繁荣。它们因川盐而兴起，成为推动地方经济、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连接川黔地区及两民族文化文化的纽带。

二、川盐入黔线路

由于四川盐场大多数位于长江干流及其支流上，因此川盐入黔的运输线路是以长江主干流与支流乌江、赤水、綦江、永宁河及其以下的陆路组成的水、陆综合运输网络线，它源于四川东部(今渝东)，对鄂、渝、湘、黔交汇地区均产生过巨大影响。在川黔之间最有名的即是永岸、仁岸、綦岸和涪岸。《四川盐法志》载四大盐岸“旧制由大江至此换船溯流折入岸河日转江，永岸由纳谿转江，自叙永入黔岸；仁岸由合江转江，自仁怀厅入黔；綦岸由江津之江口转江入黔；涪岸由涪转江，自酉阳之龚滩入黔，……其在转江州县换船过载，不许起岸贮店，以防搀越。”^①

1. 永岸

川盐自五通桥或自流井运出，至纳溪卸载转入永宁河，改用小船运载，逆水行至叙永，让后向南陆运分两路。一路经赤水到达毕节，运往大定、黔西州、威宁、水城、兴义、普安(盘县)各府厅；另一路过雪山关经大定的瓢儿井至大定，平远州(今织金)、普定而达安顺府城、永宁州、镇宁州。清末民初，川盐经永岸入黔线路根据史家考证分为7条。

第一条:叙永至普安厅。途经50里至普市，110里至赤水河，100里至金银山，60里至毕节，70里至沙坝，30里至兔场，120里至南毗，80里至水城厅，110里至鸡官营，90里至代马，90里至普安厅，全程共910里。第二条:叙永至威宁州。途经320里至毕节，100里至七星关，30里至牛闲塘，70里至七家湾，60里至横水塘，60里至威宁州，全程共640里。第三条:叙永至兴义府新城。途经420里至七星关，100里至挪呼，50里至水城厅，60里至八家寨，70里至高石坎，120里至立碑，120里至地瓜坡，40里至青山，再行60里至新城，全程共1040里。第四条:叙永至马姑河。途经420里至七星关，50里至黑章(赫章)，60里至马姑河，全程共530里。第五条:叙永至贞丰州。途经100里至普宜，180里至瓢儿井，90里至大定府，140里至兔场，100里至鸡场，100里至郎岱厅，180里至贞丰州，全程共890里。第六条:叙永至归化厅。途经280里至瓢儿井，190里至茶店，71里至平远州，110里至三岔河，70里至安顺府，140里至归化厅，全程共860里。第七条:叙永至永宁州。途经430里至三岔河，100里至镇宁州，100里至永宁州，全程共630余里。^②

清光绪初年，实行官运的永岸盐业被山西、陕西及贵州籍的大商人垄断，分为西帮和黔帮，并先后建立了十三家盐号。西帮有:崇修公(陈子杨)、福泰永(赵笃卿)、义发益(赵玉山)、三益公(李仲公)、天成裕(张集成)、集义和；黔帮有:德昌裕(余竹之)、世兴荣、集义生(谌祖佑)、魁盛兴(王继藩)、永昌公(曾照祥)、永福公(贾光溥)、兴盛昌(孙锡成)。③十三家盐号每年大约销盐1986引，由官运总局派人到犍为、富顺等县收购，再督运到永叙，然后指派给十三家盐号，按核定配额交款领盐，用马驮人背运往贵州，供应给大定、安顺、兴义各府及普安厅等地。民国以来到抗战前后，由永岸入黔的川盐销售范围已扩展到28个县。

2. 仁岸

据民国《续遵义府志》载，川盐由自贡运至泸州，再运至合江，以合江为仁岸起点，水陆结合，分段运输。由合江溯赤水河至仁怀厅(今赤水县)，经猿猴、二郎滩、兴隆滩至仁怀县的茅台，上岸后再分运至贵阳、定番、安顺、罗斛、黔西州、平远州、平越、都匀等地。史载“自合江至贵阳全程527公罩，合江至安顺615公罩”。[6] 286

合江至茅台:合江水运经三江口至仁怀厅(赤水县)约150余里，仁怀厅至猿猴滩约80里，猿猴(元厚)至土城50里，土城至二郎滩80里，二郎滩至兴隆滩20里，兴隆滩至茅台约120里。盐务管理部门在赤水、元厚、土城、二郎滩、马桑坪、茅台等地建有盐仓，供装卸中转运。^④

茅台转陆运:一经鸭溪、刀靶水至贵阳；二经鸭溪、团溪、瓮安、猪场，至平越(今福泉)牛场；三经新场(今金沙)、滥泥沟(今大关)、镇西卫(今卫城)至清镇；四经滥泥沟至六广(陆广)，平远州(今织金)；五经滥泥沟、滴淦桥(滴淦桥)至安平(今平坝)。[6] 286 除此之外，川盐自茅台运往贵州各地分销还有其他一些路线，如传统的民间古道和时已建成的驿道。

由此可见，合江至茅台主要依靠赤水河水运，而茅台站以下均为陆运，全靠人背马驮。清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楨派唐炯改革贵州盐务，限定各岸盐商，仁岸盐商共四家，分别是陕西商人开设的协兴隆、义盛隆，贵州商人华联辉开设的永隆裕和永发祥。通过仁岸的四大盐号，川盐运销到了贵阳、定番、都匀、罗斛、金沙、安顺、瓮安、平越、新场、清镇、平远、安平等地。

3. 綦岸

自流井食盐运至四川江津县的几江口，沿綦江水运 140 里，经盖石、赶水、羊蹄至贵州桐梓县松坎起岸进仓，再陆运至各销售地区。陆运分销线路有两条，一是由松坎至遵义城，再经遵义转运贵阳或湄潭、瓮安等地；另一条是由松坎入正安县。^[7]“民国时期商盐运线，……綦边销区(原名綦岸)由江津循长江转入綦江县后，一经东溪盖石硐、羊蹄洞而至松坎，一经三溪而至石角镇，……自松坎经桐梓、遵义而至贵阳，及自石角镇至安场，……及遵义再分两线，一至湄潭，一至贵阳。”^{[6] 274, 285}其中自松坎盘滩陆运至遵义，达贵阳的路线与明代川黔驿大道所经线路基本一致。

从清代中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綦岸食盐销售范围除黔北的桐梓、遵义、正安、道真、绥阳、凤岗、湄潭、习水等县外，另有息烽、清镇、龙里、平坝、贵定、瓮安、福泉、黄平、镇远、施秉、三穗、锦屏、玉屏、剑河等县。

4. 涪岸

清代至民国时期，由于人为原因和自然灾害，造成了盐运路线的变化，故难以确定准确的涪岸盐运路线，大致来说涪岸以四川境内涪陵为起点，溯乌江经彭水、龚滩至沿河而上思南，全程水运共 519 公里。^{[6] 285}陆路一由彭水经务川达正安；二由沿河经秀山、松桃至铜仁，再由石阡经岑巩，转水运至镇远。①其中沿河地理位置特殊，水陆兼备，地位尤为重要。从涪岸盐运路线来看，通过黔江道入黔的盐供给范围主要是今贵州黔东北地区。

三、川盐入黔文化遗存及其特点

(一) 入黔沿线文化遗存情况调查

与川盐有关的遗存涉及古道、关隘、桥梁、渡口、古镇、盐号、民居、寺庙、会馆、宫殿、祠堂、宅第、作坊、井泉等有形文化遗存。这些文化节点显示，通过盐文化的传播，带动和促进了整个黔北地区的商业兴盛和经济繁荣，反过来更加丰富和充实了盐文化的内容，它们的存在无疑是今天我们研究区域经济的发展及人口流动格局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笔者对川盐入黔贵州境内沿线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作了初步统计：

永岸沿线:共计 49 处，其中国保单位 12 处，省保单位 6 处，州、县保单位 6 处，未核定 25 处。

仁岸沿线:共计 77 处，其中国保单位 10 处，省、市保单位 11 处，县保单位 16 处，未核定 40 处。

綦岸沿线:共计 54 处，其中国保单位 4 处，省、市保单位 8 处，州、县保单位 7 处，未核定 35 处。

涪岸沿线:共计:30 处，其中国保单位 6 处，省保单位 3 处，州、县保单位 4 处，未核定 17 处。

(二) 川盐入黔线路特点

首先，川盐入黔线路是水、陆结合，分段运输。从盐的生产地起，很好地利用了长江及其支流，进入贵州境内，则利用了

赤水河、乌江等水系。因此，河道沿线古镇及其相关的古建筑多深深地打上了盐文化的烙印，部分遗址保存较为完好。

其次，从沿线文化遗存总体情况来看，石窟、宝塔、寺庙、宫殿、祠堂遗存所占比例不少，反映了沿线宗教的兴盛和宗教艺术的繁荣。有文献资料记载，民国早期，贵州境内的沿河、思南、石阡、务川、印江等地区有据可查的寺庙多达 600 余座，僧人近千人，原因之一是从事与盐有关的行业的人们，借助中原地区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神灵的保佑；之二则是乌江盐油航运通道的治理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道教和佛教文化的传播。

再次，四川所蕴藏的丰富井盐资源和它潜在的高额利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持续吸引大量商人和外来移民，特别是清咸丰、同治年间，各地商贾云集盐产地及盐运沿线，他们携家带口，带着家乡的文化加入盐业大军，或从事运输，或开商铺，带动了其他商业活动的开展，刺激和推动着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各地帮派，如“陕西帮”、“山西帮”、“安徽帮”、“湖北帮”等。为了在商业活动中维护自身的利益，显示地位与财富，同时抒发思乡之情，沟通交流情感，加强帮派集体意识，在沿线兴建不同风格的盐业会馆，为川盐入黔线路文化遗产增色不少。

四、面临的问题及保护建议

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来看，上述诸多与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有关的文化节点都应是保护的對象，但川盐入黔文化遗产线路保护，如今面临着许多问题：

1. 线路所经的区域内，城镇林立，人口众多，相关建筑、遗址、遗迹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近年来，高速公路、铁路的修建，水库、电站的建设，工业园区、产业园区的建立等，使文化遗存面临消亡。
2. 保护工作经费不足，专业人员缺乏。沿线大量的文化遗存长期暴露户外，如不采取科学、长效的保护措施，毁坏直至消亡势在必行。
3. 政府对旅游开发尺度把握不够准确。川盐入黔沿线古镇密集，保留了丰富盐业文化旅游资源，但个别乡镇无视上级部门保护规划，导致小镇居民在老街上不遵循原有建筑风格翻修房屋，严重破坏了小镇整体风貌。

为此，我们慎重建议：

一是加强法规体系建设，这是文化遗存保护长效化的重要保证。建议相关省市根据实际情况联合出台有关川盐古道地方性专项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加大执法力度，采取在省(市)区域间交叉执法检查的方式进行监督，确保文化遗产本体及周边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二是强化政策引导和基础研究。沿线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从政策层面加强川盐文化线路的研究和引导，通过政府会议、政府公报、研究论坛、新闻媒体等形式，对川盐文化线路的概念、分布、保护等进行广泛宣传。联合开展沿线文物古迹、文化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摸清与盐文化相关的各类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景观资源的数量、类型与分布，公布调查清单，对重要遗存，要及时列为或申报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编制保护规划，使其得到应有的保护。同时，通过课题招标、课题引导等形式，促进相关研究开展，形成省际研究联盟，鼓励做好基础研究、保护理论和保护技术研究。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川盐文化线路专题研究的学术交流，采取宣言、倡议、规程等形式加强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之间的横向联系。

三是编制战略发展规划。川盐文化线路涉及多区域、多部门、多领域，必须具备强有力的宏观战略和微观策略才能确保保护利用有序、有效地推进，因此，编制整体性的保护战略规划显得十分重要。建议相关省市联合制订“川盐文化线路保护与发展战略规划”，并纳入各省(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同时把川盐文化线路的保护与“一带一路”、扶贫攻坚、区域协调发

展等工作结合起来，统筹规划文化旅游、文化建设、文化扶贫、文化输出、社会发展等目标。

四是寻找合理利用的方法。采取延续(或赋予新的功能)古盐道功能、建设盐业专题博物馆、开展适度盐文化旅游和休闲旅游等方式，对川盐文化线路进行合理利用，并注意避免过度商业化、旅游化和追求短期效益。盐业古镇和旅游景点的开发，要由文化、国土、林业、环境、旅游等部门进行开发前的充分评估，对已开发和正准备开发的盐文化精品旅游线，要组织人力对各类遗产进行普查、评估、登记，将其纳入开发后的监督管理，并由政府下文，政府、民间共同参与保护。同时做好利用监管工作，不能将遗产区、遗产地作为企业资产进行经营，特别是不能将国有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村)及其管理机构整体交由企业管理。

五是运营的统筹和策划。川盐文化线路应从沿线区域实际出发，探索文化遗产的公共性、公益性、文化性和教育性运营的准入机制，构建多元化运营主体的局面。但运营必须以相关法规、规划为依据，不得对川盐文化遗产价值的各个方面造成不利影响或破坏。同时，做好沿线文物古迹的运营策划，解决川盐古道主线、支线资源配备、互补问题，合理规划运营功能分区，做好盐文化主题的策划宣传，统筹进行川盐文化线路推广、教育启智、旅游参与、餐饮住宿等。

六是输出川盐文化价值。可从政策层面出台鼓励文创人员研发与川盐文化相关的文创产品政策，推进以市场为导向，以输出川盐文化价值为目的文物古迹、遗产景区文创产品开发。

参考文献:

- [1] 单霁翔. 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 [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6:238.
- [2] 郑娜. 文化遗产的线性保护以及大众参与的探索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0-11-09.
- [3]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实录 [M]. 上海:上海书店, 1982.
- [4] 《续修四库全书》编辑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185.
- [5] 林振翰. 川盐纪要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19.
- [6]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贵州省志·商业志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 [7] 《贵州通史》编委会. 贵州通史:第3卷 [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206.